

習近平秩序

除了取消任期限制，習氏修憲還將帶來哪些深遠影響？

端傳媒編輯部 @端傳媒

2月25日下午，一條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英文網發布的消息在中文社交媒體刷屏，這條消息只有短短一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刪除憲法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不出意外，這條修憲建議將連同增設監察委員會、將「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等二十條建議一起，在數日後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獲得高票通過，為習近平在2022年繼續保持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身份鋪平道路，也在國家憲制層面開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過去五年多，習近平透過鐵腕反腐、強力軍改、「小組」治國、自命「核心」，獲得了前兩任中國領導人難以企及的權力。在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鄧小平之後首個以領導人姓名冠名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順利寫入中共黨章，並成為近9000萬黨員的指導思想；而在最高權力層——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沒有一名「60後」官員，這也意味從江澤民時代開始初具規模的兩屆任期制被打破；而在核心決策層——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習家軍」也都佔到了絕對多數。

在打破了舊秩序、樹立了絕對權威之後，習近平第二個任期要展開哪些新動作，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而修憲——這一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體制改造提出的系統性建議，是這項議題的最佳觀測點。那麼，在這次修憲建議中，哪些建議最為關鍵？為什麼會提出這

些建議？它們又會對未來中國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為你一一解析。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第14條

領導人任期制是如何確立的？

中共建政以來的前三部憲法（1954年、1975年、1978年）都沒有對國家領導職務的任職屆數作出明確限制。這一時期，由於執掌權力的都是「打江山」的革命元勳級人物，加上毛澤東「退居二線」後又復出發動文革，打倒了親手指定的繼承人劉少奇和林彪，領導人任期制在主觀和客觀上都無從建立，造成了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都是在擔任最高領導職務期間去世的。

1980年代，在對文革教訓的反思中，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提上桌面。其中鄧小平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批評領導幹部制度中存在權力過分集中、領導幹部終身制等現象，並提出領導制度的改革必須在憲法上得到反映，由國家根本法予以保證。

在這一精神指導下，隨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了「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

緊隨其後，1982年憲法也第一次明確、系統地規定了國家領導職務的任期。在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

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期中，都明確規定「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不過，該部憲法對中央軍委僅規定「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並未規定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這就給後來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近15年（1990年3月19日－2005年3月8日）在制度上留下了「後門」。

值得一提的是，從1982年憲法確立任期制的歷程不難發現，其遵循的基本路徑是「最高領導人講話——上升為全黨意志——中共中央向人大提出修憲建議——正式納入憲法文本」，而在2018年的修憲進程中，事實上也遵循了同樣的路徑，都是最高領導人「一言九鼎」，將個人意志上升為全黨意志、進而轉化為國家意志，只不過基本精神南轅北轍，在討論的充分程度上也不可同日而語。



過去五年多，習近平透過鐵腕反腐、強力軍改、「小組」治國、自命「核心」，獲得了前兩任中國領導人難以企及的權力。圖為2017年9月28日，河南省一個村莊的牆上掛上了習近平走訪當地的照片。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取消任期制是否等於恢復終身制？

此次中共中央的修憲建議中，絕大部分內容屬於「增」，僅有取消任期制這一項屬於「刪」（監察職能從行政機關中剝離除外），且沒有提供任何備選項，明確地取消了對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的限制。如果該項修憲建議獲得通過，理論上說相關職務就可以無限制連任，直至終身。

不過，在此次修憲建議公布之後，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就刊發社評《堅定支持中央修憲建議，這是理性也是信仰》，稱「根據權威解讀，這一修改不意味着恢復國家主席職務終身制.....在黨內外有一個廣泛的共識，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成功解決並將繼續有效解決黨和國家領導層依法有序更替的問題」。但對於何為「權威解讀」、如何避免「恢復終身制」、並如何「繼續有效解決」，該社評並未提供進一步解釋。

香港媒體「香港01」也刊發文章《國家主席任期無限制 等於復辟終身制？》，指出「無任期限制不等於終身制.....此次修憲雖然取消了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但追溯中共歷史，領導人還是存在隱性任期慣例」，呼籲將取消任期制「放在三中全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憲法修改建議，以及兩會這個大背景下來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歷次修憲的過程中，事實上不乏對兩屆任期制之外其他模式的討論，例如在1982年憲法的草案討論稿中，曾經將國務院總理、副總理連續任職限制為三屆，其他領導職務為兩屆，但反對者當時認為，連任三屆仍然是「半終身制」，因此在最後表決通過的草案中，各項領導職務統一限定為兩屆，以體現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決心。

為什麼要用修憲的方式？

在中共十九大沒有「接班人」浮出水面後，外界就普遍預計習近平將在2022年二十大上繼續尋求連任。但因為憲法第79條列明，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一硬性規定無疑對於他在「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個職務合一）中謀求10年以上任期不利。

如果不修改憲法，習近平在第二個任期結束後，只能保留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雖然這對權力行使並無太大妨礙，但另由他人擔任國家主席，無疑會多少分薄習的權威。此外，自1993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接替楊尚昆出任國家主席後，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所謂「三位一體」的最高領導模式一直延續至今（但在2002年到2004年，將近兩年的時間裏，胡錦濤僅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仍由江澤民擔任）。



修憲前後，「三位一體」領導體制的變化。圖：端傳媒設計部

如前文所述，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已經掌握了絕對權力，修憲的阻力相對較小。因而有分析認為，在權力空前的時間點，與其通過相對委婉的「普京模式」（普京1999年出任總理，2000年當選總統，2008

年再次出任總理，2012年再次當選總統。這種不修改憲法，以更換職位延續政權的模式被稱為普京模式）延續最高權力，倒不如直接修憲，一步到位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制，為「三位一體」的無限延續掃清制度障礙。

中國憲法學者對任期制的捍衛

如何用現代法政話語來詮釋中國特色的黨政二元體制，歷來是中國憲法學界面臨的理論和實踐難題。

此前一個思路，是將黨內的遴選政治局常委的「七上八下」年齡限制、選拔接班梯隊進入政治局常委、總書記連任不超過兩屆等「政治規矩」，詮釋為中國特色的「憲法慣例」。其中蘊含的思路是，將總書記的任期限制，向憲法中有明文規定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看齊。

然而此次修憲的特點在於，不是總書記任期向國家主席任期看齊，而是後者向前者看齊，原本明文規定的任期，退而成為無章可循的模糊地帶。

在中國學者近年來的研究中，對於任期制基本持肯定立場，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論述，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韓大元在《法學》2017年第11期上發表的文章《任期制在我國憲法中的規範意義》。

在文章中，韓大元回顧了任期制的歷史沿革，並主張引入「目的論解釋」，即從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目的出發，認為在常規連續任職限制之外，還應將不同最高領導職務之間的轉任（例如從國務院總理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中斷連任之後再任等情形都納入「連續任職」的概念之中。

此外，文章還特別強調，在涉及任期制的修憲時應保持謹慎，不應損及1982年憲法的基本精神。「為防止正在履職的國家領導人藉助憲法

修改突破對其任期限制，即使修改了任期制，憲法對於任職期限與任期屆數的調整，只能自該職務的下一屆任期生效」。這一文章被視為修憲風聲放出之後，憲法學界迄今最明確的抵制聲音。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一位中紀委書記能像王岐山這般光彩奪目。圖為2017年10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出席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攝：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增設監察委

從制度變革的意義上說，此次修憲建議中監察委員會的設立，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

相較於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只是一個禮儀性和象徵性的國家元首，並不具有實權。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主要是在制度層面解決了「三位一體」協調一致的問題，確保了最高領導人的權威不被分散，而監察委——這一權力巨大的常設機構的設立，卻分分鐘會對從中央到地方的日常政治運作產生巨大影響。

懸而未決的憲法地位

在此次公布的修憲建議中，涉及監察委的內容佔到近半數篇幅，其中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關」下增加了全新的第七節。從目前表述來看，監察委的若干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傳統的「一府兩院」（政府、法院、檢察院）從此將變成「一府一委兩院」，而且從多處行文順序上來看，這一新成立的機構，地位排在法院和檢察院之前，如「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第3條第3款），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第67條）等。這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監察委的政治地位和權力配置將超越法院和檢察院。



「一府一委兩院」和人大的關係。圖：端傳媒設計部

其次，此次修憲建議中涉及監察委的條目雖然眾多，但並沒有涉及監察委的職權。新增的第124條規定「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

定」，相反，國務院、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都僅規定「組織由法律規定」。這意味着，監察委的職權在憲法中沒有明確依據（僅間接提及「辦理職務違法 and 職務犯罪案件」）。而127條「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內涵不清，要依靠下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該法律目前仍在審議中，預計將在3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來確定，這使得法學界和公檢法實務界都擔心，各級監察委可能會成為難以納入法治軌道、只聽命於本級首長的超級強力部門。

再次，修憲建議中規定，監察委員會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即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級監察委員會，這和中國目前的檢察機關原則相同，顯示出二者在性質和職能上的近似性。同時建議規定，監察機關辦理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相互配合，互相制約」，相比此前公、檢、法三家在刑事訴訟中「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係，少了「分工合作」內容。屆時各級監察委如何同公檢法部門、尤其是同各級檢察院分工，是此次修憲懸而未決的問題。

黨權的國家化

「監察委員會」這一名稱並非新生事物，在中共黨史中曾反覆出現。早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就成立「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但其性質屬於黨的機構，而非國家機構。1927年的黨章也新設「監察委員會」一章，不過1928年中共六大又在黨章中刪除了這一章，監察委員會也隨之撤銷，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重新設立。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成立黨內監督組織，並將其命名為「紀律檢查委員會」，由朱德擔任中紀委書記。1955年，又將其更名為「監察委員會」。1969年九大再度刪除黨章中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內容，直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重設「紀律檢查委員會」，並延續至今。

和此次修憲不同，上述監察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雖然歷經多次反覆，但都屬於黨內監督機構。而此次設立的監察委員會，則屬於憲定

的國家機構，其法律淵源在於憲法。這也是為何2016年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進行監察體制試點、以及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一審稿發布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時，遭遇憲法學界嗆聲的原因所在。後者的理據就在於，《監察法》及監察委在憲法上缺乏根據，要通過《監察法》和設立監察委，就非先修憲不可。

監察委員會和紀委有什麼區別？



監察委

紀委

國家機構

機構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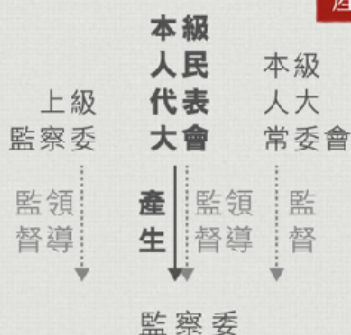
中共黨內機構

轄區內所有行使
公權力的公職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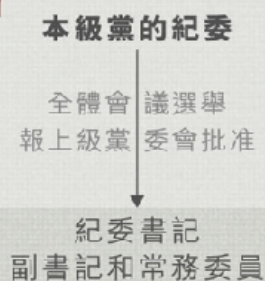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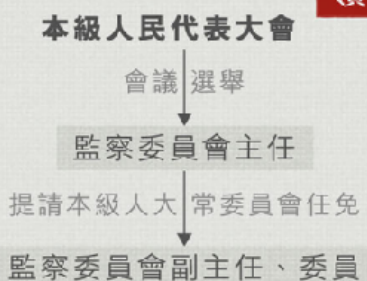
監督範圍

轄區內黨員幹部，
尤其是領導幹部

產生程序



領導任命



監督、調查、處置

職權

監督、問責、執紀

訊問、詢問、留置、
搜查、調取、查封、
扣押、勘驗檢查等

措施

談話提醒、約談函
詢、通報曝光；巡
視、全面派駐、執
紀審查、決定處分

來源：《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監察委和紀委有什麼區別？圖：端傳媒設計部

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承擔監察國家公職人員職能的，主要是國務院下屬的監察部及地方各級監察機關。自1993年起，黨的各級紀檢委和同級監察部門就實行合署辦公，即通稱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但在目前的黨政二元權力格局中，紀委和監察部門的地位並不對稱，在最高層的體現尤其明顯。自1997年，時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升任政治局常委以來，最近二十年來中紀委書記一直由政治局常委擔綱，而監察部首長在黨內級別通常為政治局委員，行政職務為部長，須接受國務院總理領導。而在修憲之後，目前隸屬於國務院的監察部和國家預防腐敗局、以及隸屬於最高檢的反貪總局，都將併入監察委，雖然同樣和中紀委合二為一，但權力地位上更為對等。

因此，監察委的設立，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黨政二元格局下權力的重新配置，是黨權進一步國家化的表現。此外，過往曾出現過的監察部門首長（例如中紀委書記）缺乏國家層面身份、外事活動中無法得到對等待遇的問題，相信也會迎刃而解。

「習近平思想」寫入憲法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第1條

此次修憲建議，還有一個重要的看點，就是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同時寫入憲法，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指引思想」。

中共向來重視理論論述，亦非常講究「名正言順」。所以從最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後來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會先被寫入黨章，再被寫入憲法。不過，由於胡錦濤「十年弱主」，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十七大被寫入黨章後，不但隔了五年到十八大才成為全黨指導思想，而且一直沒有被寫進憲法。此次修憲，雖然科學發展觀也會被寫入憲法，但與強勢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相比，有明顯的「搭車」色彩。

中國歷任領導人理論思想從被寫入黨章到被寫入憲法的時間間隔各不相同，但從1997年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被寫入黨章開始，這一間隔多少能反映出領導人在黨內的威望。

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學習小組」



習近平思想理論體系包括哪些內容。圖：端傳媒設計部

「毛澤東思想」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寫入黨章，並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但1956年八大上，為了配合批評斯大林個人崇拜，黨章中刪除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論述，而在1969年的九大上，黨章中又恢復了相關規定。在1954年首部憲法中，為體現所謂新民主主義特徵，沒有提及「毛澤東思想」。而後，在1975年的憲法中，首次寫入了「毛澤東思想」，並被其後的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所沿襲至今。

「鄧小平理論」於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上被寫入黨章，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正式寫入憲法，時隔將近兩年。但鄧小平本人於1997年2月19日去世，因此這項政治工程是由江澤民主導，在鄧本人身後完成的。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由江澤民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8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翌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被寫入黨章，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寫入憲法。

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去年10月十九大上被提出的同時就被寫入黨章，而不出意外的話，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將被寫入憲法，這一從黨章到憲法的速度也超過了歷任領導人。

歷任中國領導人理論思想寫入黨章、憲法的時間



毛澤東思想

1945年中共七大寫入黨章

1975年寫入憲法



鄧小平理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寫入黨章

1999年寫入憲法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寫入黨章

2004年寫入憲法



科學發展觀

2007年中共十七大寫入黨章

2018年提議寫入憲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2017年中共十九大寫入黨章

2018年提議寫入憲法

歷任中國領導人理論思想寫入黨章、憲法的時間。圖：端傳媒設計部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名目只在憲法序言中出現，但由於其內容龐雜，其他多處修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例如：改「法制」為「法治」（序言第七段）、增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序言第十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序言第十二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第一條第二款）等等。

結語：「閃電戰」式修憲

此次修憲建議中蘊含諸多不確切因素，但並不妨礙程序上以非常規方式緊鑼密鼓地推進。

1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九屆二中全會，根據會議公報，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但這份建議內容雪藏一個多月，始終沒有公布，直到2月25日才正式對外公布。

此前一天（2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更加注重發揮憲法重要作用，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於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九屆三中全會。主題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討論向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建議的人事安排。

微博搜索禁詞



施逆行 封禪 復辟 統江湖 我反對 稱帝 登基 倒車 黃袍加身 袁世凱 勸進 張勳 萬歲 萬代 千秋 吾皇 蔡鵬 長生不老 洪憲 不要臉 元年 袁世凱 號大頭 年號

中共中央的修憲建議公布後，新浪微博上的「敏感詞」。圖：端傳媒設計部

這種時間節奏的反常之處在於，三中全會比常規的十月會期大幅提前了七個多月，調整到兩會之前召開，與二中全會僅間隔一個多月，而且前一天剛剛正式對外公布修憲建議，次日就開會進行商議。

此前觀察人士曾認為，此次修憲草案最遲將於2019年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但在修憲建議公布之後，中國官方已經明確宣布，準備將修憲建議提交即將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這也意味着，此次修憲從正式公布建議、被外界知曉到完成投票，如果沒有遭遇重大阻力的話，最快可能在三週之內完成。而中國官方和

憲法學者至今津津樂道的是，在1982年憲法起草過程中，協商醞釀過程長達兩年、草案還提交全民進行了四個多月的討論。相比這種解凍時期的田園牧歌，2018年的習氏修憲，堪稱是一次「閃電戰」式的操作。

修憲迴避不了的接班人問題，毛時代動盪會否重現？

白信 @端傳媒

在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前夜，舊曆新年氣氛未退之際，新華社公布了二中全會的修憲草案，一時社交媒體輿論大譁，也令世界吃驚。這一修憲草案的修改幅度之大，是1982年憲法之後歷次修憲文本中改動最多的，只是並未有朝向更為改革、更為民主的方向前進，而是空前強化了黨國體制論述，譬如第一次在憲法正文中加進了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

特別的是，這次修憲如暗渡陳倉一般，包含了對憲法第79條第3款的修正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去除了對國家主席連任的名義限制後，在中央軍委主席和黨總書記（何況修憲文本首次在正文裏明確了黨的領導地位）沒有任期規定的條件下，一個集黨政軍三者權力為一身、且無任何形式約束的超級總統制，或者終身總統制便形成了。

筆者早在五年前已預言修憲時刻的到來，並且後來在端傳媒上深入分析了習近平身上的新毛主義和執政理念；加上過去五年習發動的所有運動，都在按部就班地消滅黨內外挑戰力量、營造領袖氣質，這次修憲可謂在意料之中。可以想見，即將召開的第十三屆人大，經過專門挑選的代表們將會沒有懸念地按下表決器，批准這一攬子的修憲建議，迎來一位「親自看守民族復興進程的偉大領袖」，陪伴到至少2035。2035是中共十九大上所確立的民族復興節點，也是今年央視春晚上極紅的TFBoys組合演唱的歌名元素（《我和2035有個約》）。

可是，毛時代政治動盪的根源卻到今天仍未解決，那就是權力交接的接班人問題。鄧時代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至今仍然得到相當多精英和民眾的支持，除了致富因素，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在處理接班人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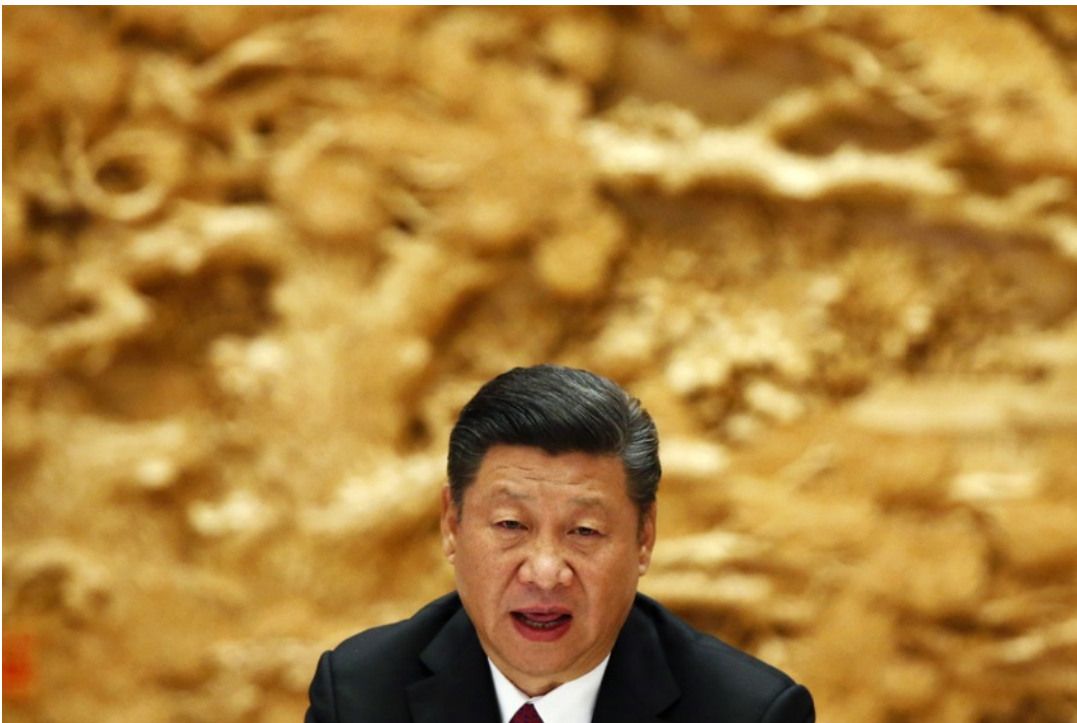
題上的開放，乃至在鄧身後，為挑選接班人而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黨內民主，強勢如江澤民也遵守了兩次連任的默契。而今次修憲等於用擱置接班人的辦法，基本杜絕了未來採取民主方式的解決可能。由此是否可能帶來中國未來政局的潛在動盪呢？這或許才是國際社會更為關注的問題。

以俄為師，柔性政變

在毛時代，從1950年代到1976年毛去世，甚至毛身後的幾年裏，接班人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共，也是幾乎歷次權力鬥爭和政治運動背後的肇因。高崗因此成為1949年後的第一個犧牲品，而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鬥爭以路線鬥爭的方式，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在「四清」運動中激化，然後引發全民浩劫的「文革」。即使在文革的高潮——1969年的「九大」上，雖然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卻也因為毛試探性地推舉張春橋作為隔代接班人，而埋下了日後林彪出逃的種子。在毛的最後幾年，接班人問題同樣貫穿着中共的權力鬥爭，最終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結束，而真正的權力交替遲至華國鋒下台才算完成。

正常的權力交接無法解決，因為接班人問題而造成如此動盪、如此殘酷的局面，或許正是鄧小平努力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初衷。在他主政期間，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制至少在名義上建立起來了、在機制上運作起來了，並且在他身後順利運轉到江、胡的二十餘年。這一集體領導體制的出現，和其他共產國家在強人體制結束後的短暫過渡時期的轉型幾乎一致。例如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鐵托（狄托）在1980年去世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採取集體領導制，但是米洛舍維奇（米洛塞維奇）則從1987年起利用科索沃問題贏得歡迎，於1989年成為塞爾維亞總統，然後以新政治強人的身份，發動了民族主義內戰。蘇聯在後極權主義時期的集體領導制過於短暫，幾乎被人忽略，僅僅為所謂「8. 19」政變的短短三天，馬上就被葉利欽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延續至今的普京（普丁）模式。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過去五年來不斷地「以俄為師」，逐漸建立起一套普京模式的個人集權體制和民族主義轉型，堪稱一場柔性政變。習時代大大降低了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地位，在打擊政治對手的同時，消滅着常委們的分工權力，取而代之的決策核心，是一個非常委委員構成的裙帶圈子。直到今天，這場柔性政變才算告一段落，卻未徹底結束。因為，雖然不能簡單地將中國未來等同於1990年代的巴爾幹危機，但是，這次修憲基調本身就蘊含着許多經典的不確定性，可能在未來繼續困擾着中國政治和國際社會。



白信：此次修憲的意義，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在於發展了一種「晚期威權主義」，以習近平的個人威權加上黨國憲政主義維繫政黨的長久統治。攝：Thomas Peter - Pool/Getty Images

對中國政權穩定有幫助？

簡單地說，這次修憲的基調有着濃重的黨國色彩，包括強化黨的領導地位論述、強化意識形態條款、新增監察委作為一個事實上向最高領袖負責的特權行動部門等等，都旨在明確以往模糊的、涉及四項基本原則的爭論。在很多人看來，這次修憲似乎回歸了毛時代的七五憲法，卻更可能是為未來的合憲性審查做準備，避免憲法危機。這一做

法，顯示習和毛的最大區別在於制度化與否。從過去五年習的改革來看，他的新毛主義更傾向於以各種頂層設計和所謂社會主義法治所代表的制度化建設和國家主義建設。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才可能看出未來的接班人問題是否會導致毛時代的動盪。

至少在理論上，相比起毛時代的革命化、去制度化、反官僚化，習氏憲法所確立的終身「總統」制，反倒可能防止派系鬥爭和權力鬥爭上升到圍繞接班人的鬥爭，後者是你死我活的、更為根本的，並且更有利於利用不同派系的鬥爭。對普通民眾來說，反倒像回歸了毛時代或者皇權社會，多了一些心理安慰。這些都對中國政權穩定有實質幫助。

更重要的是，新的權力集中體制也消滅了江湖時代的寡頭體制，以及這種寡頭體制所派生的利益集團政治和寡頭經濟，如過去五年外界依次看到被整肅的能源、互聯網和金融行業等，這些行業內的大案無一不和常委級別或者黨內元老相關。習近平有時也掛在嘴邊的「把權力關進籠子」，正是針對這些黨內大佬級官僚。並且，習不僅通過反腐運動和設立監察委，還試圖以憲法宣誓的方式重建官僚的效忠。這種黨國憲政主義的模式，也可能極大地緩解民眾對官僚體制的不滿，有助於政權的穩定。

所以總體來說，此次修憲的意義，在於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一種「晚期威權主義」，以個人威權加上黨國憲政主義維繫政黨的長久統治，也在此框架內緩解內部矛盾，將權力的集體壟斷造成的體制性危機，轉化為十九大所提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進而轉化為一個頗具20世紀上半葉色彩的民族國家模式，即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體。

晚期威權主義政權的虛無特質

可是，在修憲完成後，原來僅具名義上國家元首意義的國家主席，也成為這個民族國家的最高權力代表。由此，便產生了憲法文本內含的危機可能，即名義上最高權力代表的全國人大和國家主席的關係問題。

這一理論上的憲法衝突，固然可能繼續被黨所領導的人大所遮蔽，卻也可能因為官僚體制被約束，而在未來因着民眾的民主意願上升，將不滿轉化為直接的政治訴求，進而成為憲法危機，如同去年底以來在伊朗所發生的抗議，民眾把抗議目標直接指向最高宗教領袖和宗教戒律。相比中國過去二十餘年少有挑戰憲法的維權抗爭而言，這次修憲也形同幫助轉換了抗爭目標，開闢了一個更為直接的新戰場，從而根本改變了中國未來政治的性質。這才是晚期威權主義當中「晚期」的本來意義，好比197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的出現和批判。

在這意義上，作為世界範圍內新民族主義潮流下的產物，中國的修憲正幫助中國建立一個「過時」的民族國家體制，也更大程度地如同去年習在達沃斯論壇的講話一般，把自己的內部穩定牢牢地與全球資本主義綑綁在一起。對照修憲草案條文，正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70週年，文本共產主義與現實資本主義的巨大反差、反西方意識形態和對全球化的高度依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或許可以解釋這一晚期威權主義政權的虛無特質，也可能意味着無限鬥爭的可能。畢竟，20世紀的歷史已經教給我們足夠豐富的政治教訓。接班人的問題能夠暫時擱置，卻無法逃避；對民眾來說，生命的短暫相比民主的理想更不足道。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鄧小平遺產的終結，由黨天下到習天下

梁一夢 @端傳媒

中共中央建議，在中國憲法中刪去有關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字眼。消息一出，微信朋友圈和臉書上簡直炸開了鍋。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倒退性質太過明顯，令朋友圈出現較一致的反彈情緒。

今次的修憲是為習近平度身訂造的，這點幾無異議。然而令我好奇的是，為什麼習近平要這樣做。最簡單的調侃式說法，當然是直指習近平想要「稱帝」，但只要想深一層，就可以明白這種批評未必有錯，可是意義不大。

在現代政治中，掌控權力的方法非常多，以中共而言，實際最高領導人和名義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情況，出現過不止一次。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向來沒必要把所有名義最高領導的實職都拿在手上。以往的慣例顯示，甚至只要拿着中央軍委主席就夠了，如鄧小平；亦有拿着所有要職但權力基礎不穩的，如華國鋒。

習近平在今日的中國政壇，權力基礎已很穩固，就算日後想要繼續掌權，也可以仿效普京（普丁）或是鄧小平，為何他會挑選這種直接粗暴的延任模式？這點值得思考。

中共建政至今，出現過的政治強人有毛、鄧二人，之後的領導人都沒法建立相同的威信。這當然和時代相關，但亦和領導人出身的背景相關。初代的兩位強人領導，都參與及領導了開國過程，威信無可置疑，亦能完全掌握軍隊。這種優勢，在江、胡身上都不存在。

而更重要的是，中共經歷文革浩劫後，組織內部亦出現反彈。二代強人鄧小平，也在文革中吃盡苦頭。鄧明顯不希望再出現一個毛澤東，於是矢志於內部行政改革，建立出一個有較強內部制約的權力分布體制。中共不少人事安排的「慣例」，事實上都形成於鄧小平年代末期。被鄧小平欽點接班的兩代領導人，亦延續了這些慣例——在江、胡年代，他們也只能擔任協商政治中的較大持份者，而非領袖。

在這種脈絡下，習要挑戰的，已不是某一位黨內對手，而是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黨內共識政治。免除任期限制，不是這個過程的第一輪，而是其中一環。

相對江、胡，習並非由鄧小平指任，沒有不能推翻鄧小平的歷史包袱，加上文革殷鑑漸遠等種種因素，都有利於習近平挑戰黨內的共識政治。可是，這個政治工程的難度仍然甚大，習近平的對手，並不是另一位黨內成員，而是一種已形成的慣性。

有謂政治本身就是共識，共識則透過規章和默契來達致。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屬於重要而正面的人物，而鄧的政治共識建設，經過兩代領導實行之後，已被黨內外廣為認識和接受。習近平面對的，其實是鄧小平對他的無形約束。

打破連任限制，是終結鄧小平構想的一環。

在毛、鄧時期，領袖自帶統治權威，個人大於組織，甚至可以漠視組織任何設定，無人敢有半句不是，亦沒有太大必要以體制上的職位去為自己增加合法性，但習近平始終沒有毛、鄧的「神性」。至少在現階段，他仍需依賴組織上的職位，因此才需要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可是，打破組織原有的共識，仍然是有風險的。習近平從執政開始，一步步操作過來，手段既穩且狠，當中有不少效法中國宮庭鬥爭的故智。

早在2013年上任初期，習便架設了新的黨內決策組織，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名，建立多個小組，由他自己一把抓，架空了原有的體制，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他任內，亦出現了一種政治風向：捧毛抑鄧。雖然他不能公開否定鄧小平，但仍然盡力把他的政治遺產影響降低；中共自江澤民年代開始逐步成行的接班人機制亦被他打破，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沒有明顯的繼承人，而前任胡錦濤培養的接班人之一孫政才也在去年7月落馬，這亦反映出，反貪可以如何作為內部競爭的工具之一。

習近平把中共轉型的政治工程，似乎已完成了一大半，接下來他有什麼招數可出，將是當代中國研究的重大看點。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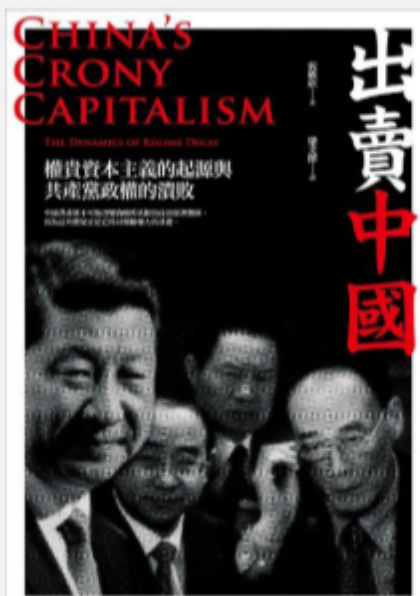
專訪裴敏欣：習近平終結了「後天安門秩序」，然後呢？

端傳媒記者 張潔平 發自香港 @端傳媒

在政治學者裴敏欣看來，2012年是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強勢拐點——它不僅拉開了中共領導人換屆的帷幕，習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終結了此前兩屆中共領導人所延續了20年的「後天安門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麼？習究竟憑什麼能夠展開新秩序？眼下人們感受到的反腐敗、高官落馬、富豪自危、政治高壓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嗎？它又會將中國牽引向什麼樣的未來？

端傳媒日前在香港專訪了這位師承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並邀請他評點中國當下的政治現象與走勢。

59歲的裴敏欣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1980年代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研究中國政治、中美關係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蘇改革比較的專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國轉型陷阱的專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關於中國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關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發表的論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中國轉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時間，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書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譯為《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2017年7月在台灣八旗出版社面世。



《出賣中國》

作者：裴敏欣

譯者：梁文傑

出版時間：2017年7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

在評點當下政治局勢之前，不妨回顧一下，裴敏欣在專著與演講中不斷闡釋過的，他對中國的幾個基本判斷：

- 1.中國的專制體制已經進入衰落期。衰落期可以很長，衰落可以觀察，崩潰無法預測。對衰落期的判斷，裴敏欣個人認為是10年左右。
- 2.從社會經濟現狀和全球比較來看，中國已經進入亨廷頓所定義的「轉型區」，也即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具備政權轉型的客觀條件，發生轉型的可能性高。但仍缺少主觀條件。
- 3.中國的專制是後極權體制，不是威權體制，前者比後者對政黨、經濟、國家機器和社會的控制要嚴密得多。中國已經錯過了從後極權向威權轉型的改革時機。以世界經驗來看，後極權國家的轉型幾乎都是以革命告終。
- 4.如今中國轉型的最可能模式是改革和革命的混合（「Refolution」），裴將之命名為「改良式革命」。

5.政權可以選擇不主動改革，但不改有不改的成本，客觀上難以長期持續。

在裴敏欣發表於《民主期刊》的論文中，他舉例證：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高於台灣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於韓國1987年的水平，在適合比較的35個國家之中，中國高於30個國家，不光進入了「轉型區」，而且進入了其中比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國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專制政體的國家，幾乎全是產油國。裴敏欣認為，政治學研究發現，產油國可以通過自然資源開發獲取暴利，養活專制，而不需要從民間攝取財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轉型，但中國則非常困難。若經濟持續發展，能維持專制政體的可能性不大。

在這樣的框架中，如何看待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政治走向？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危機，習顯然深有所感，在他當政後的數次黨內談話都可見其憂慮。但他求諸的種種藥方，能扭轉局勢，改變衰敗期的本質嗎？十九大臨近，怎樣判斷中國會不會主動轉型？

以下是端傳媒專訪裴敏欣的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最近提出，習近平終結了「後天安門秩序」，究竟什麼是「後天安門秩序」？

裴敏欣（以下簡稱裴）：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共產黨實際形成了一套內部運作的新型規則，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體領導（分權），兩者加起來，其實就是分贓，禮貌點叫權、利共享。而習近平的上台，終結了這種秩序，告別了菁英抱團、分贓聯盟規則，從集體領導，轉向個人領導，他個人確立了領導權威。這是很重大的發展。

端：為什麼習近平可以打破後天安門秩序？

裴：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地利」就是說，有偶然因素。第一個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兩個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活着，且兩人不合。在中國，一般前任領導人活着，你要鞏固權力就很困難，但習碰上的情況恰好是，前兩任領導人對他的害怕遠遠低於他們互相之間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錦濤，下台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實力，如果聰明一點，你要和江澤民抱成一團來防止一個新威脅。從政治常理上講，一個新領導人上來，胡跟江的派系應該成為一個聯盟，但是由於他們之間的分歧，他們無法抱團，這就給習近平創造了一個逐個擊破的有利條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調動總體很順，這就是所謂的天時。他碰上了相對弱的對手，而且不團結。

第二個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來倒台，現在看來後果的確很嚴重。因為薄是唯一一個可以和習近平叫板的人，但因為王立軍事件，這個人很偶然倒台了，改變了中共高層內部的格局：沒有一個強勢政治人物可以跟習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時間內，在沒有強有力對手的情況下迅速鞏固權力。

而「人和」則是，他抓住了公眾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強勢反腐。這也是不同陣營的最大公約數——人們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員腐敗，要求整治，是一個共同需求。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獲得回報的一個舉動。

端：我們稍稍回退一點，這樣看，2012年是近年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拐點。但此前一直有人認為，2008年是重要的拐點。您怎麼看？

裴：2008年的確是拐點。有幾層含義：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領導層一下子對中國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國模式這個詞用的頻率很少，08年之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都常常出現了。那一年奧運，中國一黨專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現了。

第二，從政治層面來講，就是08之後，到了胡錦濤執政的第二屆，「九龍治水」的現象更加明顯，又出現一些政策上的失誤，中央的權威極度弱化。08年之後，國內的經濟政策開始有錯誤，四萬億、中國的信貸泡沫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同時，國內開始面臨少數民族和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挑戰，拉薩、新疆、零八憲章，都是那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搞得「唱紅打黑」運動，也是08年開始。

08年這一個拐點，放開了許多可能性，但也已經感覺，「後天安門體制」快要走到盡頭。到了12年又是一個拐點，強勢一拐。

端：那下一個問題就是，2012年習上台，打破了舊秩序，穩固了權力，之後要幹什麼？

裴：對，之後看他要幹嗎，是決定今後五年、十年中國政治走向如何發展的一個關鍵。破之後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國務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見分曉了，到時候，習第二任往哪個方向走，會明確得不能再明確。為什麼這麼說？這是一個基本政治學的分析。你沒辦法揣測一個人的動機，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學分析。所謂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為均衡狀態下你什麼都不能幹。打破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在均衡內部，打破力量平衡，進行各方力量的重組。在中國，鄧小平92年南巡之後共產黨的改革就是這一種，在內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發言權，技術派、改革派贏得絕對統治地位；第二種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澤東的文革，內部死板他沒辦法，於是引入外部的群眾力量來打破。現在要看習在今後一年內，如何打破這種均衡。只有兩種破法，沒有第三種破法。過去五年，習打破的只是權力菁英的遊戲規則，但還沒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國的官僚體制有幾百萬人在那裏，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還沒有真動。



裴敏欣。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但他也可以什麼都不動，不是嗎？

裴：他什麼都不做也可以，這就是所謂的自保的生存戰略。基本判斷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風險太大，那就考慮在不打破均衡的情況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個人的領導地位鞏固，然後通過政治體制本身的自我保護能力去鞏固權力，加強控制。一個是對社會的控制，一個是對菁英的控制。

但不動也有不動的成本。對習來說，最大的危機就是他的表現、政績能否持續。很簡單，你能否提供實惠？現在是後意識形態時代，共產黨幹部沒人願意去延安住窯洞。不管是普通民眾也好，政權菁英也好，都是實惠人，吃煙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門面撐下去，能賺錢我就跟你走，這個任務完不成，指標達不到，那就麻煩了。社會會有直接反應，菁英接著會分化。但實證角度還是要量化，能撐五年、十年還是十五年？這個很不確定，因為這裏涉及到一個群眾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終是有限的。舉個例子，為什麼76年「四人幫」一下

子就被推倒了，因為發生了綜合性危機，該發生的問題都發生了，人們的承受能力到極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賣中國》一書裏，非常細緻地剖析了腐敗的內在結構，給「官商勾結」、「權貴資本主義」這些已經陳詞濫調的說法，配上兩百多個案例的實證分析，指出是什麼因素導致90年代以來勾結式腐敗大規模出現，這些因素又如何導致整個體制走向衰敗。我想問的是，習近平顯然也看到了這種衰敗，似乎為了不觸碰一黨專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種各樣的藥方緩解症狀。比如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你覺得，奏效嗎？

裴：反腐有幾種類型，運動式反腐是其中一種。但國際經驗和中國歷史經驗都說明，運動反腐是無效的。很簡單，你不可能永遠保持高壓。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謂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要設立什麼規章制度，那沒用，而是一個全面的體系：政府對資源的支配、政府對自身權力的約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還有自下而上的制約，包括輿論跟民間團體等。你如果看中國的反腐，形式非常單一，根本看不見其他的措施。理論上說，運動式反腐肯定失敗。

但為什麼還要這樣搞呢？首先，從中共本身歷史來講，運動式反腐是共產黨的慣用手段。從「三反」、「五反」到現在，劉青山、張子善到現在薄熙來、周永康，有很長的連續性；第二，運動反腐往往可以實現短期的政治考慮。如果你去看數字，中共領導人剛上台時——新任領導人第一任第一屆第一年，每年送進監獄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澤民、胡錦濤都是這樣。去檢索一下中央紀委資料裏「移送司法」的數字就知道了。利用運動式反腐來鞏固權力，這也是慣例；第三，它能短期滿足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因為真正要解決腐敗問題，是要做長期的制度建設，但制度建設是看不見的，時間很長，沒有政治回報，而運動式反腐的政治回報很明顯：貪官送進監獄電視上一報導，大家就會覺得你幹了事。所以運動式反腐一點都不奇怪。習近平和以

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續一年，但他起碼持續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動七、八個高官，而習一年要動三十幾個。我認為這說明他想要改變八九之後的政治秩序。

端：您認為習的反腐運動真誠嗎？您的書中也提到，反腐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權力布局，可能引發精英階層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敵意。但您覺得它和習的政治理念究竟有無聯繫？

裴：不談動機，只看結果的話，從運動式反腐中看不到習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見改變政治秩序：以前權威不清晰，現在權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說到底靠什麼價值來治國，官員清廉是一個價值，但這不是完全價值，還有其他比如政府權力限制、個人尊嚴、個人產權人權得到保護等等，這些價值至少在這個運動之中沒有得到任何體現。

端：習求諸的另一個解方似乎是道德，從整治家風，到從嚴治黨，推崇賢能政治。道德有用嗎？

裴：道德的約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說成是最後一道防線。現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實是逢場作戲。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願意說假話，一個說謊的成本而已，沒有時間精力。但真反腐的話，成本就厲害了，監督政府的成本、輿論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現很多新變化，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您覺得這會給中國發展和維繫體制，帶來新的空間嗎？

裴：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對中共來講，它的意識形態沒有強抵抗，沒有生存的威脅了，所以這對它有利。但總體來說，我認為國際環境對中國體制的維持是不利的。第一，共產黨生存的法寶之一是經濟發展帶來的政績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國作為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受衝擊，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毫無疑問是中國。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會打折扣，這是第

一點不利之處；第二，現在美國講「美國優先」，你說是保護主義也好、孤立主義也好，總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點都不認為，中國現在可以打開香檳慶祝美國霸權沒了，輪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國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個沒有警察管的社區，治安可能更糟糕。無霸主無序，許多以前由美國承擔的隱形成本馬上會變成顯性成本。戰國時代不一定對中國好，過去幾十年裏中國是搭了便車享受了無數好處的，而在戰國時代，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現在無法預測的風險、危機。很簡單，北韓，美國不管誰管？另外，特朗普政府雖然在全球上宣稱美國第一、美國優先，但它肯定認為中國是一個對手。以前美國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國融入西方秩序主導的世界，若這個秩序沒了，美國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國對着幹，對抗風險很大。

端：您怎麼評價中國近年來越來越積極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帶一路」？

裴：我覺得中國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識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國不行了，是時候抓住機遇、有所作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無意識的。要知道許多政權在國際社會的行為並不是深思熟慮的，它是體制本來的慣性，它在國內就做慣了，不考慮換了環境事情影響會怎麼樣，不是理性不理性的問題，根本是習慣性的本能。比如「一帶一路」，我認為這個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領導上來要有所作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機，以及戰略互補性。但是對「一帶一路」的風險、長期考慮、可行性都沒有真正看到。但是由於中國的體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個體制會被動員起來來實施這個指令。沒有人會說皇帝沒有穿衣服。「一帶一路」可能是中國的陷阱。不只是中國，很多國家領導人都會犯這樣的錯誤，以為很多難題只要一個政策出去就會迎勢而解，不可能的。



裴敏欣於香港城市大學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攝：陳焯輝/端傳媒

端：您怎麼看郭文貴和肖建華？這兩個富商，一個流亡國外，以自媒體方式廣傳資訊，一個從香港被帶回大陸控制，銷聲匿跡。他們對中國當下的政治局面會有影響嗎？

裴：郭文貴很簡單，三個字：沒影響。他是有很大娛樂作用，本來中國政治是沒有什麼戲劇性的，現在有這麼一個戲劇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現在有故事了。當然他說的話你沒有辦法證實，誰都可以猜。他的出現應該是個偶然，一般有錢人都比較低調。反過來說，如果他這樣說的話都會有影響，那說明這個政治體制出大問題了。所謂裏應外合，他根本就沒有「裏應」。

肖建華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幾層。第一層，在後天安門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戰略已經失效了。在後天安門時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給所有官員好處，擺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壓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從最安全變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萬利的策略，變成有百害而無一利，這說明時代變

了。肖建華牽涉很多政治局委員、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像，他被綁架之後，基本上想要反對習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裏。不需要具體做什麼，他的存在就是一個證人、一個武器，好像核彈頭製造的威懾平衡。

第二層，中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涉及到所有經濟層面，最深的是國有資產和金融，因為這裏面可以一下子產生暴富。但肖建華揭示的更大問題是，權貴裏面，權比貴更重要。中國的叢林法則裏，有錢人只是很肥的豬，它不是老虎、獅子、狼，掌握政治權力的才是後者。豬再肥，在短期內他們只能跟虎狼暫時聯盟，但到最終他們還是獵物，不是猛獸。雖說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權給限制了，否則永遠是權比貴更厲害。但在其他威權國家，貴還是貴，它雖然比權弱，但它還是貴；中國的貴，可以一夜之間一錢不值，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權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滅對手，根本就毫無制約。

端：您怎麼看中國近年來對港台的政策，這種政策，能否達到執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認為，北京對港台政策很難達到它的目的。這還是一個人心向背的問題：你如何贏得人家的心。你強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沒有能力讓人家做你想讓他做的事情。這是一個強力的權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獨，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統，統跟獨之間的空間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讓你不高興、讓你頭疼，最終成了一個無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國教書多年，怎麼看學生這個世代的中國年輕人？

裴：我覺得要理解，中國年輕世代的成長，是沒有經歷過極黑暗的壓迫的。像我們這一輩是見過的，親身體驗過那種荒謬是怎麼回事，所以反彈比較強烈。畢竟作為一代人他們還是比較順。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們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權，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

一定的安全感，哪個制度能提供他，他就會對哪個制度忠誠。中國現在這個體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對年輕人還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說，出國更愛國，這是沒錯。但那是在國外愛國，沒用的，他回國就是兩碼事了。在美國他是愛國者，在中國他就是叛逆者，這種案例太多了，一點都不奇怪。他在國外感到自己是少數群體，西方洋人是「他們」，但到了回到中國，誰是「他們」？強權威權是他們，就成了他的對立面。

（實習生張竟禕對本文亦有貢獻）

專訪吳國光：權力劇場中，威權是如何被「加冕」的？

端傳媒記者 戚振宇 發自香港 @端傳媒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北京，人民大會堂，两千多名十九大黨代表同時舉手。

「不同意的，請舉手。」全場肅靜。幾秒鐘後，會場不同位置的六名計票人分別高喊「沒有」、「沒有」、「沒有」……

中共黨章修正案就此在無一人反對、無一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全場掌聲雷動。

這是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九大）閉幕前，表決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時的一幕。坐在主席台中央的習近平號令舉手表決，「同意」時全場舉手的場景並不陌生，但「不同意請舉手」時的七聲「沒有」，卻意味深長。

根據中共黨章，黨代會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修訂黨的章程、選舉黨的全國領導層（即中央委員會）。近年來，以中共黨代會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學者吳國光，用「權力的劇場」來形容這一運作機制：「它像一部精心編導的劇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戲劇表演那樣的精心設計、練習和彩排，要贏得觀眾們發自肺腑的掌聲。觀眾首先是參會代表們，掌聲則是一種儀式，表明他們認可台上演員——領導人們，並同時認可他們的提議、方案和權力。」

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引入了代表大會的制度設計，來合法化自己的威權統治。但在中共內部，既然領導人希望掌控一切，為什麼還要

不厭其煩地保留黨代會制度，並煞有介事地保持它的運作？「精心編導劇目」的意義在哪裏？兩千多名地位頗高的黨代表，又如何能安於觀眾的身份，保持意見高度一致？這樣「權力劇場」的存在，對中國政治又有什麼樣的深刻影響？



60歲的吳國光從中共體制內出身，1980年代，他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涯無限延長下去，走上學術道路，先後在美國、香港任教，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他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政治轉型、全球化等議題，即將出版的中文新書《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英文版於2015年出版），正是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吳國光提出了「制度操控」的概念：這種操控與一般的政治操控不同，它通過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是一種以民主為其虛表與操控為其實裏的一種複雜運作，目的在於為掌權的現任領導人和那些已經預定上台的領導人尋求合法性，使他們精心準備的政綱和人事安排得到順利的接受。《權力的劇場》一書，就是通過展現這種制度性虛偽，解碼中共黨代會的神話謎思。



吳國光近照。受訪者提供

2017年12月，端傳媒專訪了吳國光，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在《權力的劇場》這本書中提到一個核心概念——「制度操控」，究竟什麼是「制度操控」？

吳國光（以下簡稱吳）：在政治學研究中，有些學者強調「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中共黨代會就是一個正式制度；另外很多學者則強調「非正式政治」的作用，就是那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幕後而偏離規則的權力運作，例如我們常說的「政治手腕」。我想強調的是，任何政治運作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都是兩者並存、相互作用的。

一般認為，在威權主義政治、非民主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很多人長期認為中共黨代會實際上是一個擺設，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提出的問題就是：在非正式政治壓倒一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創立一個正式制度並保持它的運作？

我發現，正式制度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這種操控和一般的政治操控還不一樣。一般的政治操控，就好比說搞點陰謀詭計，或者是不按章法、在背後搞一些小動作。但制度操控不一樣，這種操控已經嵌入到了規範、規則和程序的創設與運用之中。制度操控的實質，就是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比如中共黨代會，雖然黨章中對黨代會的職權和運作有着明確規定，但領導層通過對制度規則的各種策略式運用，將選舉、討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扭曲變形，從而使黨代表們投出了一個符合領導層原先預設的結果。但它看起來不像是牽線木偶那樣，每一下我都要指導你怎麼做；透過制度操控，我有更精妙的辦法，讓你感覺不到你是按照我的意願投票的，甚至說在你按照我的意願投票之後，還會很自豪地說我行使了我的權利。這個就是中共這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和一般的威權主義制度有非常大的區別。



2017年10月18日，安徽淮北的學生在觀看十九大開幕式。攝：STR/AFP/Getty Images

端：為什麼中共要大費周章，透過對遊戲規則的精妙操控來改變遊戲結果呢？直接改變遊戲規則會不會是一件更容易、風險更低的事？

吳：其原因在於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威權主義政治的運作，是前台一個做法，後台一個做法。本來有後台這套做法已經可以了，為什麼它還需要有前台這一套東西呢？是因為它需要前台這套東西來形成權力合法化的機制。

和民主制度不同，威權政治將公眾排斥在選擇和決定領導人的過程之外，缺少精英群體之外的一個仲裁者，這產生了兩個問題：

首先，威權政治中的贏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為程序上的第三方裁判者的祝福。我說我贏了我就贏了，政治精英之間的競爭勝負是沒有裁判的，如果有的話就是贏家自己成為自己的裁判。但精英政敵可以用任何手段將這位贏家幹掉，只要做成了，就贏得了權力，而這種權力需要一層「合法性」的外衣；

其次，威權體制的領導人沒有面對公眾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政治非常精巧的一個設計是，它把精英之間誰該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和大眾是不是承認你這個精英取得權力的合法性的問題，用投票這一個辦法全解決了，一石兩鳥。但威權主義下，即便贏得精英的內部競爭，但在大眾面前是不是也合法呢？領導人自己也不知道。

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置身於這兩大挑戰的交匯處，必然時刻擔心自己權威的脆弱性：就結果來說，自我任命的合法性讓可信度打了折扣，失敗者和大眾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來說，當贏家獲得權力的方式遭到質疑時，其合法性可能會在根本上遭到否定。

於是，當代威權主義引進了憲法、選舉、代表大會等這套本來屬於民主制度的東西，試圖在今天這個時代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除非通過選舉，領導人的其他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均會受到質疑。所以，他們只得借用了民主的一套形式，但它又不是民主制度，

其實質還是威權主義，自己決定自己是領導人，只是要走完所謂的民主過程。

端：我很好奇這套「合法性外衣」的裁製過程，換句話說，中共是通過哪些手段實現「制度操控」的呢？

吳：截至目前，中共黨代會已經開了十九屆了，我對這麼多屆黨代會有個歷史分段的研究。從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中共實際上處於一種比較幼稚的狀態，沒有發展出什麼像樣的制度操控，主要是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共的運作，不存在黨內的領導層在黨員之中的領導力。誰能當領導人呢？共產國際說是誰就是誰。這裏面就很少有產生於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你只要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

對於黨代會運作的制度操控，可以說是從七大開始的。從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在這長達17年的時間裏，一方面共產國際對於中共的影響力日漸衰微，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準備七大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並奠定了此後中共黨代會運作的基本框架。這套操控方法，包括召開會議的時間、會期的長短、參會代表由誰構成、他們用什麼方法產生，以及會議進程如何管控等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圖為中共七大會場。攝：Imagine China

舉個很小的例子，一進七大會場，代表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還有主席台上方懸掛的橫幅，上面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我還沒來選誰是偉大領袖呢，你標語已經掛出來了。當然，現在十九大的會場上不再掛習近平的畫像了。但我們知道，十九大的代表也不像七大代表那樣「桀驁不馴」了。那時候還沒有建立起一套規則，加上當時中共各地方的領導人，都是自己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梟雄人物。現在這些代表，不用掛誰的像，你說我不投習近平的票，那不是政治上自殺嗎？

端：說到開會時間，最近四十年，中共黨代會的召開時間規律多了，每五年一次，和毛澤東時代差異很大。

吳：對，在毛澤東掌權的將近四十年時間裏，一共才召開過四次黨代會（即七大到十大），其中七大（1945年召開）和八大（1956年召開）隔了11年，八大和九大（1969年召開）又隔了13年，我們可以看

到，即便毛透過制度操控使得每次黨代會都能達成他的願望，但他也不願意召開太多大會。原因在於，一方面，根據制度規定，黨代表是有自主投票權利的，操控他們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另一方面，毛澤東在當時的合法性已經非常高了，即使不經黨代會確認，你敢說我毛澤東不是你們想要的領導人嗎？

由於九大（1969年）和十大（1973年）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7年間召開，在毛掌握最高權力的前30年（1938年到1968年）裏，一共才召開過兩次黨代會。

但在「後毛澤東時代」，從1982年十二大起，中共黨代會開始進入了一個簡單的制度化階段，每五年召開一次。為什麼呢？我個人的解釋就是因為毛澤東以後，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認受性沒有那麼強了，需要黨代會來週期性地給自己確認一下合法性。就像習近平，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做了很多事，反腐也好、軍改也好、提出一帶一路、中國夢也好，但只有成功召開十九大，才能讓這些東西在黨內精英中獲得合法性的認可。



2017年10月25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亮相。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端：今年10月25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剛亮相後，新華網26日隨即刊文指出，：「十七大、十八大探索採取了會議推薦的方式，但由於過度強調票的分量，帶來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會議推薦過程中簡單『劃票打勾』，導致投票隨意、民意失真，甚至投關係票、人情票」、「決定在對十九屆『兩委』委員人選深入考察、嚴格把關基礎上，通過談話調研、聽取意見、反覆醞釀、會議決定等程序逐步醞釀產生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這種方式克服了以往『大會海推』、『劃票打勾』帶來的種種弊端」，您會不會覺得這有些「制度操控」從幕後走向台前的感覺？

吳：我有留意到這個報導，它透露出了不少非常重要的情況。

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承認，在十七大、十八大籌備過程中曾經搞過摸底投票。再就是，報導也明確指出了，雖然這是一個投票的機制，但其中還是有作弊的。報導特別指出，像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這樣一些人「利用會議推薦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這說明，這種由主導者來操控選舉結果的現象顯然是存在的。

出現上述情況，有一個歷史背景。由於在八十年代，黨代表的自主性有所高漲，特別是在十三大中央委員會的預選過程中首次引進了差額選舉，就使得十三大和後來的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代表們投票投出來的結果，和最高領導層事先安排的結果有出入的情況，打亂了高層人事安排的布局。

這樣一來，最高層就要用新的辦法來操控黨代表的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把黨內對於領導人人選共識的凝聚過程大大提前，基本上拉長到黨代會開會之前將近一年的時間。一年之前就開始派人考察，調查背景、做民意測驗。包括十七大、十八大做過的摸底投票，也屬於這種共識凝聚的措施。但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相當小的一個精英圈子裏進行，包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省部級領導幹部。



毛澤東在準備七大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並奠定了此後中共黨代會運作的基本框架攝：Bettmann / Contributor / Getty Image

我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黨代表可以提出對領導人人選提出不同意見的話，那麼開會的時候讓他們表達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提前很久讓他們表達意見呢？答案是：為了易於操控。因為你來到會上以後就是代表了，按照黨章也好、中共的各種規矩也好，你都有權利表達不同意見。但是，黨代會之前，這些人的身份還不是黨代表，而是黨的幹部，作為黨的幹部是要遵從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的。之所以要拉長這個過程，就是要減低這些幹部成為代表時的投票的自主意願。

到了十九大，就沒有再採取十七大、十八大時摸底投票的辦法了，用的辦法就是「談話調研」。不是說「談話調研」這種方式有什麼特別對或不對的地方，關鍵是誰來談。如果你可以談別人也可以談，那就有些競選的味道了，但我們知道中共黨內是不允許競選的，只有你去和人談的份，別人不能去通過談話影響黨代表。最後黨代表和你談完話之後投了你的票，這就是典型的操控，是和民主原則不相容的。

端：我們看到，十九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對習近平忠誠的「新軍」也都佔到大多數，加上習沒有指定接班人，有評論認為十九大後「集體領導制」將走向終結，對於這種說法，你怎麼看？

吳：我個人認為，中共的集體領導基本上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在中共的歷史實踐中是不存在集體領導的。

中共早期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陳獨秀（中共創始人之一、首任總書記）了，他當時完全實行家長制統治。根據李達他們這些老資格中共領導人的回憶，那時候開會，如果有人對陳獨秀說的話不同意，陳動不動就摔茶杯，完全是一個幫會大佬的做法。很多重要的早期領導人，包括瞿秋白、李立三，作風都非常專斷，王明就更不用講了，之後就是毛澤東了。

集體領導這個東西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出來的，但毛在當時的權威恰恰是高高凌駕於他的同儕之上的（編註：毛澤東當時仍保留了最終決定權），所以集體領導這個說法和當時毛一人專斷的現實，實際上是完全不吻合的。只有在毛澤東時代之後，才開始出現了「集體領導」的一點意思，但事實上就像鄧小平對江澤民講的那樣，「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銳敘述，見《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鄧小平講得就是，毛澤東、華國鋒以後，實際上也不存在什麼集體領導，就是鄧小平說了算。這之後呢，也是鄧所說的，自己不在的時候，江澤民說了算。



鄧小平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時，他的身份就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圖為當年鄧小平在深圳特區南巡。攝：AFP/Getty Images

胡錦濤時期不能說是集體領導，因為仍然是江澤民說了算，雖然在胡時期的後幾年裏，江澤民年紀大了、退出領導崗位的時間也久了，權威有所降低，但並不代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能夠自主做主決策，這是做不到的。江澤民雖然在2004年辭去軍委主席之後沒有正式職務，但這和鄧小平晚年是一樣的，鄧小平晚年也沒有正式的職務。鄧小平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再次改變中國的時候，他的身份就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但還是他說了算。毛澤東以後，這些中共領導人專權的程度雖然比不上毛，但是也不能稱之為一個集體領導的時代。

我想，今天習近平權力這麼大，實際上是承接了江澤民說了算的時代。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不斷擴權的時候會被認為是和江澤民構成了矛盾。因為過去是江澤民說了算，現在要習近平說了算，中間沒有一個所謂胡錦濤集體領導的時代。

所以，當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的權威建立以後，挑戰的不是集體領導制，而是以前那個說了算的人。習近平說了算，在制度層面，就是對江澤民說了算的一個延續。



吳國光認為，胡錦濤時期不能說是集體領導，因為仍然是江澤民說了算。圖為2012年11月14日，胡錦濤和江澤民出席中共十八大閉幕式。攝：Feng Li/Getty Images

端：十九大之前，有很多討論說會不會恢復黨中央主席制，當然最後並沒有恢復，我想，恢復黨中央主席制的话，「一個人說了算」就變得更加名正言順了。您怎麼看待這種討論呢？黨中央主席的職位真的有可能被恢復嗎？

吳：第一，當年毛澤東在1945年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時候，他先擔任的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編註：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推舉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945年，七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

處主席）。在擔任這兩個職務時，他擁有了最終決定權，如果習近平要在二十大上再次稱主席，可能會援引這個先例。

第二，近年來中共高層可能已經形成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最高領導人在最高領導崗位上只能做兩屆。如果內部有這樣一個共識的話，那麼習近平有兩個選擇：一是直接否認這個共識，因為最高領導做幾屆本來就沒有寫進黨章；再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最高領導的職位改為主席，我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做了兩屆，現在不做了，改做主席了，這個也許幫助他減少一些阻力。

其實，這些職位的設立，也都在「制度操控」之中。實行主席制的時候，曾經長期不設副主席，直到八大的時候才設立了副主席（編註：十二大時決定不再設立黨主席和副主席），但設多少個，黨章也是沒有規定的。對中共來說，副主席這個職位非常重要，除了主席就是副主席了，但這麼重要的位置，可以一會有一會沒有，一會多一會少，這些都給制度操控留下空間。

端：這次十九大報告中，將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十三大時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修改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您怎麼看這種提法？是否預示着習將在下一個任期展開的新動作？

吳：這次提出所謂主要矛盾的轉變，我看主要是為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做鋪墊的；社會主要矛盾轉變了，所以要進入新時代了。但是，這次對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概括，有點不大高明，因為大眾對於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是人類有史以來以來就一直存在的，並不是今天中國特有的。十九大報告沒有找到中國在今天特定時代的主要矛盾，而是把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拿來說了一下，因此，對於「新時代」到底是什麼，也是沒有論述清楚的。

當然，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到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樣兩個長期的目標。但這都是施政的一個基本規劃，而具體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系統的論述。



2017年12月3日，浙江烏鎮，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開幕。蘋果公司CEO庫克致辭。攝：Imagine China

端：不久前，中共剛舉辦了和世界政黨高層的對話會、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再加上「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可以說中國這五年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並提出了諸如「網絡主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概念。這也引起很多老牌民主國家的警惕，澳大利亞總理最近向國會提交的《反間諜和反外國干預法案》主要就是針對中國，特朗普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吳：中國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之後，要影響世界政經秩序的雄心是越來越大了。以這種經濟體量，加上全球化使得其他國家對中國的

倚賴程度非常高，中國有了新的國際戰略。今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越來越注重本土利益，對一些重要的國際議題，例如氣候變化等等，越來越不願意承擔責任。而中國在這時候選擇趁勢而上，越來越想扮演一個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就像十九大閉幕之後，中國官方媒體說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總之，韜光養晦已經是過去時了，本世紀以來，國際上已經越來越感受到中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雄心。在習近平任內，這個雄心一定更大、步驟更快。這就給世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從西方民主國家誕生以來，主導世界秩序的基本上都是歐美的民主國家。即使是在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雖然在一定程度平分秋色，但是圍繞在蘇聯周圍的基本還是欠發達國家，所以世界經濟和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還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的陣營當中。但中國因為巨大的人口總量，加上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在國際上的崛起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現在顯露出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挑戰，這完全是個新問題。

端：三個月前，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Stephen K. Bannon）在一次演講中稱，中國就像是1930年的德國，「它正處在一個拐點上，可以走這條路也可以走那條路」，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吳：從西方民主國家主導世界秩序以來，也不斷遇到來自非民主的經濟上強大國家的挑戰，最早就是來自納粹德國，冷戰時期就是蘇聯了。

但今天的中國和當時的德國、蘇聯都不同。第一個不同就是，當時德國經濟雖然在一戰後迅速發展，但是經濟總量沒有那麼大，當時也不是什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蘇聯時期東西方兩個陣營經濟上基本相互隔絕。而現在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和那些主導國際秩序的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是緊密相連的，這個和以前我們看到的挑戰是非常不一樣。

第二個不同，就是剛剛講的兩個挑戰其實都是來自西方文明的內部，但中國的挑戰是完全來自東方文明。簡單講，當年德國也好、蘇聯也好，都是採取正面衝突的辦法，德國是直接軍事衝突，蘇聯則是全面對抗。但中華文明向來是比較柔性的，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有選擇的、非正面的對抗，這就使得整個形勢非常複雜。可能過去歷史上的很多經驗，都不能直接套用來解讀今天的情況。



2017年2月23日，剛剛出任白宮首席策略師不久的班農亮相保守政治行動大會（CPAC）。
攝：Bill O'Leary/Getty Images

對於來自中國的挑戰，西方主流戰略家中的一種觀點就是像班農這樣，認為中國如同當年納粹德國，要和中國對抗。這個聲音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90年代蘇聯解體，後冷戰格局剛剛形成的時候，美國就有一個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當時有兩大戰略觀點 containment（遏制、圍堵）和 engagement（介入、交往）的大辯論。雖然這次辯論最後從口頭上搞了一個折中，叫 conengagement，但實際上之後的發展是以 engagement 為主的。克林頓本來在競選期間對中國是疾言厲色的，

說「決不遷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但恰恰在他任內後期訪華之後，中美關係開始大大密切起來。他們那時候信奉的就是：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潮流，經濟得到了發展，就會實現民主化，這是 engagement 的一個基本思路。但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思路應該說是失敗的：中國確實融入了全球化，經濟飛速發展，和世界上大型經濟體都有非常密切的融合，但中國卻保留了獨特的制度。

但在九十年代中期那場大辯論之後，把中國當做主要敵人、主張全面遏制中國的想法，在西方基本上就不是一個太強有力的聲音了。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一個就是全球化使得中國的利益和那些大國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很難分割。如果中美真的出現巨大貿易戰的話，受傷的當然絕不僅僅是中國，同時也是美國；第二，中國也不是擺出一個全面對抗的姿態，而是採用一種非常柔性的戰略，無論是早先提出的「和平崛起」，還是最近習近平講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都是相當柔性的訴求，訴諸大家的共同利益。

像班農的觀點，就是單純地以歷史經驗來類比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局限，沒有看到全球化後世界經濟新的變化，也沒有看到中國作為一個挑戰者的特點。你說中國是納粹德國，但它不像納粹德國那樣咄咄逼人；你說它是蘇聯，它也沒有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也沒有像蘇聯當年那樣，搞和很多小兄弟結盟的政策。所以說，中國的出現對於世界政治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戰略家們的認知，還是停留在過去的時代，沒有能跟上形勢、對當前國際政治格局進行前瞻性的分析。

（阿唐對本文亦有貢獻）

習近平的「新時代」政治綱領：一個「革命」政黨的世俗化轉型

白信 @端傳媒

在中共過去三十多年的黨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篇大會報告。報告試圖堅持十二大上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又修正十三大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定義，然後奠定了未來30年的中共總路線，給出了一個未來中國的政治綱領。

過去一、二十年，中國社會面對着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和爆發，一直期待一個能夠提供解決方案的總綱領，並對中共特別是胡錦濤執政時期「契爾年科式」的僵化緩慢、遲遲不能響應這一訴求尤其不滿。其間，有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異議群體發起和聯署《零八憲章》，但遭到打壓，起草人之一劉曉波被判刑11年，並在十九大前幾個月死於肝癌；隨《零八憲章》運動而漸熱的、圍繞憲政改革的公共討論，也在過去幾年被消聲；持續二十餘年的公民社會運動所形成的人權律師群體、勞工組織、女權運動，和一批獨立NGO，亦先後遭到打壓。黨內代表不同路線的不同派系，也在過去五年遭到了嚴酷整肅，如倡導更激進路線的薄、周、徐、令集團，被樹為習的最大競爭對手，成為「反腐運動」、肅清餘黨的主要目標；而向民營資本提供庇護、代表官僚集團利益、也是胡溫政權非正式指定隔代接班人的孫政才，也在十九大前夕淪為大會犧牲品。

習思想的毛主義血統

然後，在肅清黨內外幾乎所有對手、全國幾無雜音的背景下，第一屆任期屆滿五年的習近平，才向全黨和公眾提交這樣的一份政治綱領，其核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13個字。在修辭上，這是對十三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再透

過各常委在報告當天下午以「抬轎子」的方式，在分組討論時一致冠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16個字，未來幾天有望寫入黨章並獲得通過，會後則相信會簡化以「習近平思想」為名，向全黨和全國公眾宣傳，企圖實現與毛澤東思想並列的黨內地位。

所以，本次大會習近平的歷史定位和權力追求是毫無掩飾的。他意圖樹立比肩毛澤東的黨內絕對權威：在確立未來中共轉型綱領的同時，徹底鞏固自身的集中權力，超越現有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制，並為未來長期連任做準備。這是十九大的核心任務，也是這次開幕報告的中心，而不像江、胡時代總書記第一次報告的同時，就要迎來「隔代指定」的候任者；這次大會沒有討論五年後接班人的議題。

習近平的理論基礎，則在於對1956年「八大」和1987年「十三大」以來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修正：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在修辭層次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擴展，建構習近平的思想框架。

其實，會前一年，習近平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號召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今年是這「兩論」發表80週年，全黨基層都被要求重讀。習近平報告的基本方法論，也是以毛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哲學為本，一方面論述新社會矛盾，同時呼籲全黨進行「偉大鬥爭」，強烈表明習思想的毛主義血統。

歷史上，如懷利（Raymond F.Wylie）的研究所證實的，「兩論」是根據毛在1937年7、8月間的講話文本編輯而成的；而「兩論」文本，一方面沿襲斯大林主義教條，同時試圖開闢毛自主性的理論嘗試，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由此，從哲學運動開始，毛展開與忠於莫斯科的王明路線的鬥爭；「兩論」成為毛樹立個人理論權威，

進而集中權力、直到「七大」上確立「毛澤東思想」領導地位的關鍵文本。



自信：本次大會習近平的歷史定位和權力追求是毫無掩飾的。攝：Sheng Jiapeng/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美好生活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另一方面，在邏輯層次上，十九大報告則以「美好生活」這樣一個充滿美國夢色彩和中產階級價值觀的修辭，取代了前30年帶着求溫飽「生存權」、強烈物質主義發展觀的鄧時代定義。報告對生態、扶貧、教育、醫療等環境和社會政策，以及對城市治理的強調，也表明這一政綱迎合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做出兩點有趣的推論：

其一，習近平智囊班子裏政治學家的話語權上升。報告修辭擺脫了胡時期報告空洞冗長、面面俱到的許諾，體例上則更接近1987年的十三大報告和1992年的十四大報告，而比胡錦濤時期的動輒十幾部分，簡

化了許多；與毛主義對矛盾、對鬥爭的強調，亦並行不悖地混搭在報告語辭中。

然而，他（們）在宣傳口徑上雖然拒絕西方式民主和普世主義價值觀，卻在政策取向上效仿美國夢和美好生活的組合，不能不說某種程度上向世界坦白了以美國為師的發展心跡，顯露了報告撰寫組當中資深政治學者的賣力。他們先後以「中國夢」加「美好生活」的組合，引領一個不強調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率，轉向內需導向和分配政策的經濟轉型。

其二，中（美）國夢和美好生活的組合，理論上則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對美好生活的哲學探討，以及新教徒們在新大陸的工業革命浪潮下，尤其是戰後經濟繁榮所創造的、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豐裕社會」圖景。在過去幾年，這一提法也屢見於中國一些「網紅」哲學家。他們不懈地對「可能生活」和「良好生活」做新柏拉圖主義的解讀，頗迎合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小清新」口味。黨內理論工作者對此的借用和發揮，其意義相當深遠，相當於一次不談階級卻通篇皆中產階級、未直接點明卻主動迎合中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轉型。

進而，如果對比此前中共意識形態及黨的報告對社會主義的強調和堅持，這種「美好生活」的轉向倒更像是放棄對社會主義的類宗教執迷，而面向人民生活的世俗化轉型。而如果對比此前追求工業化規模、擴大供給的發展模式，「美好生活」的提法則更像是一次促進內需和消費升級的國民動員，因應未來經濟下行、供給側（Supply Side）改革和環保主義造成的結構調整，提供一個持續性的消費支撐。



群眾在車站觀看習近平講話。攝：Beijing Youth Daily/VCG via Getty Images

中共世俗化轉型與面對的悖論

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世俗的原初含義是『有關時代的』」，也即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中對世俗性的解釋，而非宗教意義上的時間永恆或者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千禧年主義形態，習近平對美好生活的倡導才有了「新時代」的意義：在鄧小平「不談姓社姓資」的30年懸置後，真正開始了共產黨的世俗化轉型。

然後，也只有在此世俗時代的意義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下對現代化目標和追求民族國家建設的執著，才可能得到理解：那是一個告別共產主義革命政黨的宣言。

其剩下要做的，只是專制地自我定義人民的需求，罔顧社會的多元需求和潛在政治競爭者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或者，只是繼續在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幌子下，放棄一切超越性的理想，以維持權力和政權為最終目標，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例如，在使用鬥爭哲學和手段對付國內外矛盾的同時，本次報告最為鮮明的，就是以「切香腸」的小幅讓步方式，在所有社會矛盾激化的領域上一點點讓利，贏得迂迴空間。如教育上減免貧困地區學生的學費和寄宿費、促進高中普及，取消農村戶口消滅城鄉差別，也承諾改革計劃生育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甚至提出推動「合憲性審查」，滿足早前憲政運動的要求等等。而這一切讓步，都是在「美好生活」和均衡發展的框架下，避免觸及一部分「先覺悟起來」的公眾對更大範圍的憲改、更多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和民主轉型的要求，而至少在未來30年延緩這些憲政、民主、自由議題等形成挑戰性的運動。

理論上，這種政黨的「世俗化」轉型，代表着一個革命政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只是，這一轉型，卻需要重新利用毛主義不斷革命的動員方式，進行內部整肅和動員，而且面臨兩個長期性的轉型悖論。

其一，也是經歷過類似轉型的國民黨曾經面對的難題：是否存在永續執政的可能？與此相關，個人的終身執政到底是有助於政黨的永續執政，還是反而可能提早終結政黨執政？所謂「其亡也忽焉」，毛澤東當年進北平前面對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新毛主義者不可能逃避的難題。

其次，一個世俗化的長期執政黨，總是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並隨執政進程最終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的官僚政黨。尤其是，在繼續「現代化」所需要的技術官僚化，以及「黨領導一切」的全能主義原則全面滲透社會經濟生活的情況下，這個政黨的徹底官僚化和世俗化將會加速，也與人民的「美好生活」全面交叉、重合。這也意味着，習近平推動的反腐敗運動短期內越成功，從而完成黨的世俗化轉型、實現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那麼長期而論，便可能越為政黨在未來的全面腐敗提供土壤。

這些悖論，來自現代化過程中政黨轉型所面對的內生挑戰，無關乎外部勢力，也與十九大最為引發外界關注的兩個核心議題有關，即習近

平的權力野心和反腐運動成效。換言之，無論十九大最終決議如何、未來方向如何，一個以高姿態告別革命的政黨，無論害不害怕，都可能將一切或會危及其執政地位的挑戰，不論規模宏大還是微小，都視為革命。

那麼，當這個政黨正在試圖使出渾身解數討好一個新興中產階級，且不惜以自身全面轉型為代價，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態度變化，支持或不滿的任何邊際變動，都可能對該黨產生不可測的影響，例如去年發生的雷洋案件。這也就意味着，在一個消除了任何可見競爭力量的中共政權內部，世俗中產階級的存在本身，就是唯一不確定的力量和因素，那與中產階級生產的公共領域及其超政治的世俗性有關。

無論如何，我們都沒有對未來悲觀的理由。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毛澤東和劉少奇，習的中共更像誰？（上）

白信 @端傳媒

也許不用多少年，人們就會意識到，十八屆六中全會意味着中共的轉折點。只是，到底這一轉折是通向鞏固還是崩潰，一時間可能並不容易看得清楚。然而，透過此次全會確立的習近平「核心」地位以及他主導通過的《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和《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外界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四年習近平個人的集權化努力和中共的反腐運動正在接近收尾，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發現：反腐運動已經大大提升了反腐運動的機器——紀委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角色，甚至改變了黨自身的型態。

從紀委角度觀察中共黨的型態轉變，可能較諸「核心」角度更為重要。儘管人們也許可以輕易從本次全會「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宣示中，得出習已經取得過去三十年來中共領導人最高實際權力的結論，甚至推出中共轉向「個人黨」的趨勢研判。但是，更長期的、制度性的趨勢往往為人所忽視，焦點更容易滑向個人化的權力鬥爭，也難以解釋中國政治變動的內部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屆六中全會，雖然是一次閉門會議，卻是一次絕好的窗口，可以檢驗以往對中共政治的觀察和假說，做出校正，然後得出未來的長期趨勢。

撮其要者，本文集中三點分述之，分別涉及此次全會從表及裏試圖解決的三個關鍵：「核心」問題、組織內卷化、和政黨轉型。

核心問題，媒體議論較多，天津新任市委書記在會前也高調喊出對核心「絕對忠誠」，算是此次全會和《準則》的焦點問題；而組織內卷化，則無論學界、政界還是媒體都談得不多，卻可能是習上任以來始

終憂心忡忡的現實問題和制度痼疾，也是反腐運動和《準則》力圖挑戰與改變的。此外，組織內卷化還是理解紀委角色和中共轉型的關鍵。最後，由此引申，中共將發生怎樣的政黨再造或者轉型，相信仍然是絕大多數人想得不多的理論問題，亟需提出思考。

中共歷史上的「核心」問題

中共95年的歷史，幾乎就是路線鬥爭、派系鬥爭的歷史，從未斷過。但在中共黨史早期，這個黨的領袖——總書記的權威既來自列寧主義的黨組織本身，也來自蘇聯—第三國際的背書，並無核心之說。毛雖然在「七大」後便獲得黨內超然的領袖地位，但也曾在大躍進失敗之後的1959年被迫「退居二線」，直到發動文革才重新專斷。中共黨內核心概念的真正提出，要等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

1989年5月26日，面對學生的民主運動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陳雲在主持中顧委常委會議時時，首次提出「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到6月16日，鄧小平在與江澤民和李鵬談話時正式論述了「核心」概念，他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他藉助「核心」比擬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自我確認此前長達十年的事實「核心」地位，為鎮壓民主運動、廢黜趙紫陽尋求黨內合法性支持，並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加持其指定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

因是之故，江澤民雖然以技術官僚之身入得大寶，卻挾「核心」皇冠，才得以在鄧之後的後強人政治時代保持巨大權力，開啟了市場經濟改革，圍繞核心的裙帶政治也逐漸形成。

待到胡錦濤時代，雖有鄧的「隔代指定」，胡在性格和派系基礎軟弱，導致他始終無法擺脫前任核心的陰影，也讓中共高層的裙帶政治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迅猛經濟發展進程中，得以在集體領導的常委制下逐漸發育成「官商結合、權貴庇護」的寡頭政治。此種寡頭政

治，既是習近平上任伊始面對的黨內腐敗癥結，也是中共新的派系政治或者政治競爭的基礎。他所發動的反腐運動因此有着雙重任務，並不完全處於權力鬥爭的需要。

這也是此次《準則》和《條例》着力應對的問題。

結合毛鄧手段的「習核心」

如今，如果對照毛、鄧、江三代核心的確立過程，不難發現習近平的「核心化」簡直集毛、鄧於大成，而跳過江、胡。簡言之，儘管官方黨史把毛的領袖地位追溯到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但是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陳伯達來到延安，與相同旨趣的毛澤東共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運動手法推動，才最終在1943年樹立起毛的個人崇拜，在1945年春天的「七大」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毛的黨內核心地位，並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這其中包括了發起哲學討論、以《矛盾論》等文章樹立自己的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同時（1938-40年）開展「幹部教育運動」、發展到1942年的「整風」。

而鄧小平則是利用人民不滿和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發動黨內「真理大討論」，才得以召開轉折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於1979年初推動中美建交、發動對越戰爭，贏得西方世界的支持，清洗軍隊。鄧最終團結「八老」，在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為第一代領導核心「蓋棺定論」、罷免華國鋒後出任軍委主席職務，並在翌年的十二大上設計、成立了「中顧委」，自擔主任，取得黨內「最後拍板」的核心地位。

習的上位背景是黨內派系日益分化、複雜化，並無江、胡的指定成分，很偶然。但和鄧類似，他也得到一群革命精英（二代）的支持。

不過，習近平上位之後四年的核心化過程，卻兼具毛、鄧兩條道路——即同時展開，交替以意識形態論戰和暴力鎮壓的方式展開路線鬥爭，隨路線鬥爭開展搞團結、分化，重新劃分派系和陣營。

一方面，無論毛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討論批判王明路線的「教條主義」、還是鄧發動「真理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都是以民族主義戰爭或者政權不穩作為背景。毛在抗日戰爭爆發的背景下，利用陳伯達的論述區隔莫斯科的「統一戰線」政策，而奪得路線主導權。（莫斯科的戰略對應着國統區的文化保守主義和王明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而在阿富汗戰爭爆發後，鄧小平以對越戰爭和放棄在「亞非拉」世界輸出革命，換得西方世界的支持，成功地以冷戰綏靖，為實用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他們核心地位的鞏固都以內部清洗為前提，沒有1942年的「整風」運動，也難以召開「七大」；陳雲和鄧小平在1989年的核心之論，則以天安門的鎮壓和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為代價。

如此，方能理解習近平在過去四年先後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以類似1943年底延安「邊區高幹會」的方式，在2012年多次召開「紅二代」座談，模仿1942年整風運動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召開新的文藝座談會。他倡導儒家傳統、反對西方普世文明、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方式，回歸華爾德（Andrew G. Walder）意義上的「新傳統主義」——美國漢學家們對毛主義如何繼續的經典解讀。

並且，習近平是在南海緊張、顏色革命、香港問題等等一系列可能是被渲染、營銷的民族主義危機和黨存亡危機的背景下取得授權，然後同時展開反腐運動、淨網運動、鎮壓公民社會。換言之，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社會、政治領域多管齊下、「兩手都要抓」的運動式鬥爭方式，其導向正是為了「核心化」。十八屆六中全會，也因此可說是七大和十一屆六中全會、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合體，或許標誌着「新毛主義」的崛起。

中共組織內卷化，與新毛主義的崛起

什麼是新毛主義呢？

畢竟，人們要問，確立核心到底意味着什麼？僅僅是強化個人集權嗎？也許，僅僅通過過去四年核心化的過程，來定義新毛主義可能還為時過早。澳大利亞學者克里.布朗（Kerry Brown）不久前剛剛出版了新書[《中國和新毛主義者》]，從張志新寫到鄧力群和薄熙來，記錄了毛身後新毛主義者的興起，卻未能對習與新毛主義的關係做理論總結。十八屆六中全會，同樣未能提出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媲美的習近平思想或者習近平理論，那也許要待到十九大或者更晚。

儘管如此，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安德魯.華爾德2015年的新書《毛的中國》，再次確認了毛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何一以貫之，一方面在1956年「秘密報告」後堅持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以斯大林式的清洗運動「不斷革命」，試圖打破官僚體制。

在毛看來，層級的官僚體制本身就是腐敗的根源，而需要「不斷革命」，包括下放勞動和「三結合」。留美學者呂曉波在2000年便提出了相應的假說，認為從「大躍進」之後，毛開始「退居二線」，開始了中共的「組織內卷化」，也就是中共體制性腐敗的根源。

按照呂曉波《幹部與腐敗：中共的組織內卷化》一書的說法，大躍進正是所謂組織內卷化的開始，「三面紅旗」引發毛和官僚體系的衝突政治，黨的官僚們抗拒革命的凝聚，而領袖又拒絕官僚們的程式化，「當革命運動拒絕逐漸地官僚主義化，又無力繼續以革命動員的方式整合組織的時候」，內卷化便發生了。

中共的此種組織內卷化與毛主義並行，它們之間的緊張，既可看作中共內部鬥爭乃至改革的內部結構性動力，也可解釋中國的體制性腐敗根源。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組織的內卷化直接導致如體制內普遍設置小金庫、大建樓堂館所等招待性設施和奢靡的吃喝招待風氣，也包括習近平在本次六中全會上提到的「團團夥夥吹吹捧捧」等。就在呂曉波提出這一假說的前一年，時任總理朱鎔基主導發動了反腐運動，最終無疾而終。而習近平過去四年從「八項規定」到「打老虎蒼蠅」的

反腐運動，頗有毛氏作風，以重新樹立黨內生活作風和從嚴治黨的方式，挑戰積弊日久的「組織內卷化」。

不過，在江、胡時代，組織內卷而制度腐敗，已非小金庫之類那麼簡單，從裙帶政治到利益集團，黨的型態本身也在發生深刻轉變，往碎片化和庇護政治發展，黨內原有的派系、山頭愈益模糊的同時，出現了寡頭化型態，才有所謂「團團夥夥」之說。如此「黨內野心家、陰謀家」的溫床，產生了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和徐才厚的權勢集團，以及各地各種「窩案」，尤以山西、能源系統為嚴重，腐敗機制催生了新的派系政治。這或許正是此次全會召開的背景和主旨所在。

因此，這次六中全會的走向才不奇怪：與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相比，前者強調民主生活、反個人崇拜和幹部的專業化、年輕化。而十八屆六中全會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則強調維護中央權威的核心論，強調組織紀律和操守，整個反其道而行。換言之，核心化的核心，反腐運動之所以到後期演變為「講政治」的「政治巡視」，主旨應與毛發動文革相去不遠，都在於試圖逆轉組織內卷化趨勢。

但習近平應對組織內卷化的方式，與毛所不同的有兩點：一者，習並無能力發動文革式的大規模運動，只能仰賴黨的機器本身進行發動連續、小規模、局部的清洗，其中包括組建各種臨時性領導小組，以多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方式架空政治局，事實上廢除了常委級別的分工負責制（後者在江、胡時代已經演變為黨內新裙帶或新派系政治的機制）；二者，習並無歷史包袱，無需集合共識重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也沒有采取毛的下放幹部和成立各級革委會取代官僚機構的做法，而是相反，他傾向於各種制度化建設，即所謂「頂層設計」，來解決組織內卷化問題。這也許是新毛主義與毛主義的最大區別。

例如：六中全會剛結束，以紀委為主體的「監察委員會」就鋪開試點，首選北京、山西和浙江為試點省市。一方面，這是對紀委反腐的論功行賞，擴大紀委和監察機構，做實紀委對整個行政系統的監察權力。另一方面，如《條例》所反映的，加強紀委的垂直監督，既包括紀委系統本身垂直領導的加強，也包括增強紀委對下級機構的監督。特別對所謂高層幹部（包括中央委員）的監督，成為黨內監督的重點。黨內固有的派系活動，特別是高層的政治動作，便都將籠罩在嚴密的監視體系下而受到遏制。

這麼一來，如同國安會建立了向習個人負責的情報、安全協調和決策機制，加強黨內監督和監察委員會的建立，最終都服務於最高元首對黨和官僚系統的控制。這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傳統政治下，監察體系服務於皇權控制的角色。「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的高度威權模式便昭然若揭了。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毛澤東和劉少奇，習的中共更像誰？（下）

白信 @端傳媒

儘管「新毛主義」的說法，可以解釋反腐運動的動力和紀委制度化。但問題仍然存在：習政權的制度化傾向以及未來方向該如何評估呢？

畢竟，不僅未來數年中國政治精英層的人事變動和派系格局面臨重組，如此重大的變化還可能誘使中共再次發生政黨型態的轉型。事實上，六中全會剛結束，一系列官員調動就開始了，「兩江系」終於控制了北京市委、市府的關鍵職位，這批人馬還替換了國安部、民政部等部長級官員。中國和世界都必須面對中共內部新的關係。

政黨再造和新傳統主義

與此同時，洞悉北京政局的觀察家，早就開始預測新的中國政治強人在未來是否會繼續推動修憲，是否會延任，核心與國務院的關係何去何從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問：中國一黨制下再次樹立核心，是否因人而設？還是說將要形成制度？

理論上，這些追問都涉及到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如意大利學者薩託利（Giovanni Sartori）所追問的，一黨制的政黨「所面對的難題是誰將統治黨本身」。中國的黨國體制到底出現了怎樣的變動，多大程度上扭轉了毛時代黨統治行政、吸收國家的情況？在今天，黨國體制又如何吸收或引導新興的社會力量 and 社會衝突？這些根本問題既是追問「核心政治」，也是衡量所謂新毛主義是否成型，習和新毛主義關係如何的指針，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沿着「組織內卷化」的思路，繼續從歷史角度觀察，便會發現：六中全會對反腐運動的制度化收官，以及過去數年甚囂其上，各種

「頂層設計」的制度主義討論，都與毛主義中帶有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式、委員會制恰好相反。現在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價值觀的復甦，以及監察制度的重建方向，更合乎中共官僚組織內卷化的結果——「新傳統主義」。

在安德魯·華爾德三十年前（198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中，無論毛主義和官僚體系之間如何衝突、各種運動如何影響，貫穿在中國國家和社會關係中的，持久性因素之一，是工人與企業之間的「組織依賴」及其特殊制度文化。華爾德將之稱為「新傳統主義」。雖然這主要用來解釋傳統計劃經濟下國企中的勞動關係，距離今天的現實生活似乎已經相當遙遠，但支持此種關係的土壤，即劉少奇風格的「共產主義儒家」仍然極其強大。

這種「新傳統主義」的今日代表，也許不是習本人。迄今為止他更多述而不作，尚未找到自己的「陳伯達二世」奠定意識形態權威地位。倒是反腐運動的組織者、紀委書記王岐山，以198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背後支持者、改革開放政策重要智囊的身份，在過去十數年間積極地干預意識形態向傳統主義文化轉向，在黨內各種會議上鼓吹民族主義、文化主義和制度主義的論調，甚至罕見地與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彥等美、日知識分子公開對話，談中國道路問題。

也許正是在中共黨內官僚體系深耕多年的王岐山，作為中共「黨鞭」，或二號人物，很大程度上復甦了劉少奇意義上的新傳統主義意識形態。雖然他未像劉少奇那樣出版新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卻也與習一道，同樣提倡陽明心學，重視整頓「黨的政治生活作風」。新《準則》保留了與1980年版舊《準則》同樣的黨員要求，「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且更強調所謂「三會一課」的生活、學習制度。

修正毛主義，走向民族主義「新傳統」

換言之，王岐山和新的「整風」，屬於更「親官僚」的新傳統主義，而非原教旨毛主義。同時，與曾經的敵手——另一位公開的毛主義者薄熙來相比，習近平和王岐山都更謹慎地對待民粹式大規模運動，也更注重各種制度主義的建構，可以說，是在清洗官僚的同時再造新的官僚體系。

而且，他們已經明確表明拒絕向西方學習，試圖回到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和制度。這種新版的「中國化」，或修正的毛主義，其所指向，只能是習念念在茲的所謂「偉大民族復興」，如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和「一個領袖」所指的，更為關切民族國家的重建問題。

建設民族國家，這是毛時代囿於國際共運而尚未完成的事業，也是傳統的共產黨人與他們曾經的競爭對手——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的區別所在。這一議程從1990年代中後期復甦，從1996年台海危機和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被轟炸所引發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逐漸成為中共唯一有效的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基礎。

習今年6月造訪塞爾維亞期間，專程為前駐南聯盟使館遺址獻了花圈。而他過去四年的大部分外交行動，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一帶一路」戰略，甚而對台關係、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江澤民的政治遺產，保持了中共的意識形態連續性，民族主義也成為他的黨內合法性基礎之一。

只有圍繞民族國家建設，才可能理解習的新傳統主義回歸——對毛主義的修正。我們也才能夠理解他為何致力於集權式的、國家主義的制度建構。而對剛剛才回到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中共來說，新傳統主義的回歸，更像是應對若干經典挑戰。

無論華爾德歸納的「新傳統主義」還是薩託利對一黨制的懷疑，都是處理政黨在國家—社會關係中的角色。這一問題也引導着中共在過去

十數年極力探索轉型，卻又始終沒有確定形態。

自「三個代表」拋出，中共一度採取了廣泛吸納社會精英的政策，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黨內外要求共產黨轉型成社會民主黨或者人民黨的呼聲，也在21世紀初隨《炎黃春秋》發表謝韜的文章而興起。這一時期，在縣域層次上各種「協商民主」的試驗頗為熱鬧，各式公民社會組織隨維權運動的興起得到相當發展。薄熙來的原教旨毛主義派系（儘管也被稱作新毛主義）也在這一背景下隨中共的寡頭化而興盛，不過最終也與公民社會力量一道，都被新傳統主義的主流力量，分別當做對黨和對政權的威脅而打壓。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性質，是自治和結社；所挑戰的，是政治效忠。

但無論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還是黨內獨立派系，均不見容於追求民族主義認同的官僚政黨。他們也放棄了吸納新興資產階級的政策，甚至拒絕自身的資產階級化。這裏的新傳統主義指向，當然不僅是儒家共產主義，而是張木生在胡溫執政最後幾年所鼓吹的「回到新民主主義」，即回到1940年毛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而非與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合作。

「三個代表」被根本放棄了。

而在網絡代際方面，習近平一代屬於「早期毛主義」的龐大革命後代，他們在1970－80年代晚期毛主義時代隨「幹部解放」回到主流、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的領導集團。但在1992年後市場經濟的年代裏，他們隨年輕技術官僚的上升和黨內新派系政治的寡頭化而逐漸邊緣化。這一群人，或許才是遠遠超出簡單「紅二代」標籤的紅色官僚集團，他們有強烈的懷舊感，也擁有雄厚的資源網絡，作為最初擁戴習的黨內基本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決定習近平上任，即謝淑麗所說的黨內「選舉人團」。

相對毛主義來說，其上輩，如1940年最早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鄧拓、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深諳黨的「制度文化」，他們既是組織內卷化的主體，也是新傳統主義的主體，既是毛主義的受害者（如劉源和習本人），也能夠輕易地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對待毛主義。如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既有留蘇背景，也是最早、最堅定的毛主義者，卻親手修正了毛主義，走向實用主義路線。

習的民族主義路線，毋寧是繼承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卻可隨時以毛主義式的、更小型的「不斷革命」手法，轉身對付組織內卷化——對付那些新官僚和寡頭集團。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提供了新的「革命」動力，儘管它是以「改革」的名義進行。

由此，他們才可能再造政黨，以劉少奇式的「儒家共產主義」，結合列寧主義的紀律和組織要求，要求黨內的嚴格效忠，克服官僚主義和派系分化，重新把自身當做民族國家建設的先鋒隊。這也是唯一的國民表達渠道，以民族主義政黨的型態，讓國民實現效忠。

巧合的是，民族國家建設，與這條新毛主義或新傳統主義路線的復甦，在世界範圍內和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之類的事件相呼應。他們都在人民對民族國家的憂慮中，利用民粹主義支持，彷彿不約而同地，在後全球化的動盪時代建立起一個松散的極右政治聯盟。

歷史彷彿回到了1930年代。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e

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